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求真·至善·唯美

谢地坤自选集

谢地坤 著

QIUXIEN ZHISHAN WEIMEI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谢地坤  
◎著

# 求真·至善·唯美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谢地坤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真·至善·唯美：谢地坤自选集/谢地坤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5656-1869-7

I. ①求… II. ①谢…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9337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QI ZHEN ZHI SHAN WEI MEI

求真·至善·唯美

谢地坤自选集

谢地坤

项目统筹：杨林玉

责任编辑：来晓宇

责任设计：王征发

责任印制：何景贤

责任校对：李佳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编 100048

电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址 [www.cnupn.com.cn](http://www.cnupn.com.cn)

印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1 000mm 1/16

印张 30 插页 2

字数 340 千

定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史秋秋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宋贵伦 张文启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周一兴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童庆炳  
满运来 戴 逸

编 委 会 主 任 崔耀中 韩 凯

编 委 会 副 主 任 赵 峰 孟春利 刘 颖 梁立新 荣大力 王野霏  
杨生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孙武权 杨林玉 杨念群 吴国盛  
张 际 陈 来 陈平原 陈雨露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彭 林 韩 震

## 出版说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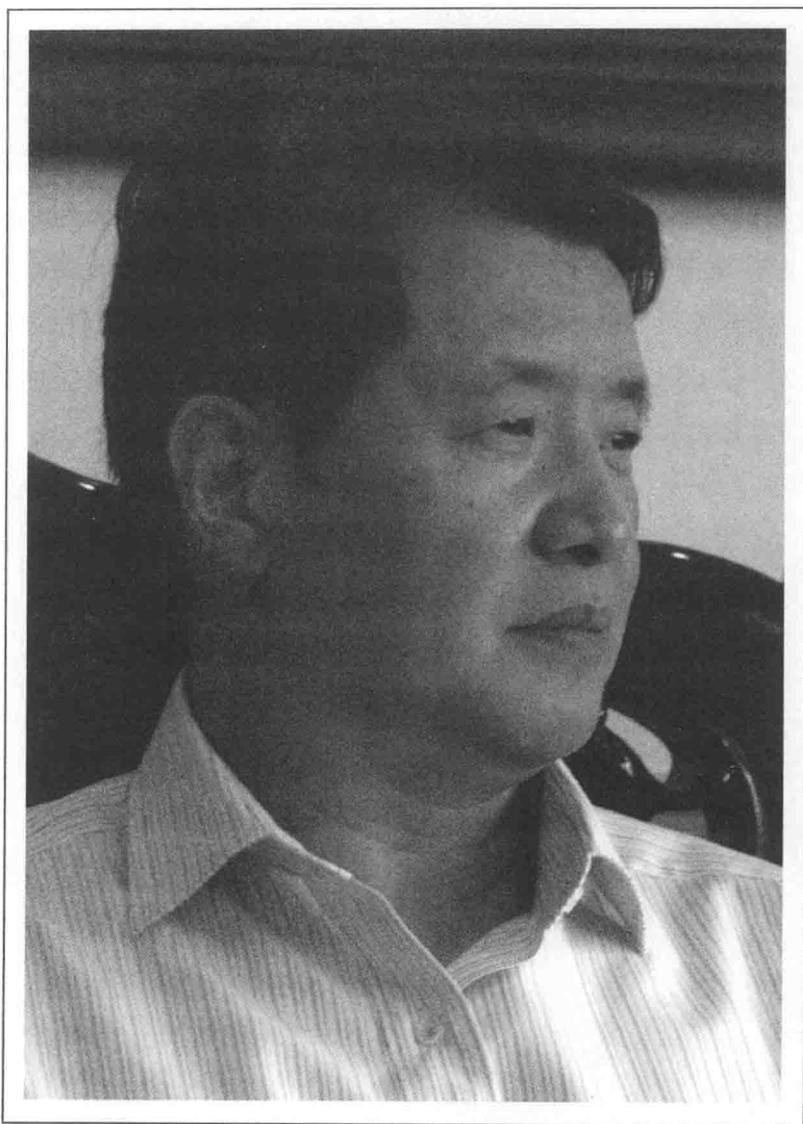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循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它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09年11月



谢地坤先生

## 哲学，永远在途中

### 一、何为哲学与哲学何为

每一个学习哲学或从事哲学工作的人都会遇到“何为哲学”和“哲学何为”这两个问题，而我之所以为这本自选集取名为“求真·至善·唯美”，意图就在表明我学习和研究哲学这门学问三十多年的点滴体会和我对这门学问的基本看法。

在我看来，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它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必然发生的一种以理论形态表现出的文化自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及其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此外，哲学还包含着信仰信念、知行关系、道德伦理、审美思维和社会实践等诸多内容，所以，哲学也是教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如何生活的学问。

哲学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产生过许许多多的流派和思想，尤其是近代以来哲学已经从原本作为各门学科之总汇的百科之学变为一门专业学科，引起了无数思想家对这门学科性质的发问和探索。但是，无论哲学怎么变化，它的唯一指向和宗旨始终是求真、至善和唯美。“求真”乃是探索万事万物的本相，追求

跨越时空限制的真理，把握客观世界的规律，说到底，这既是哲学得以兴起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人类认知精神的本质。“至善”被奉为人类道德生活的最高目的，不仅在于明德亲民、正德厚生，更重要的是要像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那样，使每个个体的意志准则始终能够同时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这样，人类作为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部落、民族、国家和人类共同体，才会真正拥有那种无私无欲、互相关爱的无上崇高的生活世界。“唯美”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而是在真和善之上、超越于世俗生活的一种向往，是人类精神期望得以驻足休憩的一种理想境界，它导引着人们永不满足、不断探索，去追寻那种融精神内容和艺术形式于一体的绝对永恒的精神家园。

当然，真、善、美是一种方向，是一种境界，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或实现。由此来看，哲学或许不能称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哲学只能是朝着一门科学的方向去发展。但正因为哲学追求一种似乎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它也就因此而与各门具体的科学区分开来。所以，哲学不只是总结归纳前人哲思的哲学史，也很难成为一门完整严密的科学；哲学不只是艰深晦涩、让人皓首穷经的玄学，也不只是教人安邦定国、经世致用的谋略。哲学关乎我们的人生，涉及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哲学教导世人，要学会怀疑，独立思考，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反抗世俗偏见，听从理性律令；哲学帮助人们诊断痛苦和欲望的脉搏，制定出摆脱精神苦难、谋求快乐人生的方案，人们因此可以减少一些迷茫、错位、惊愕、焦虑，增加一些理性和自信；哲学不是高高在上、夸夸其谈、远离世俗，而是要让世人努力寻求智慧而又远离愚蠢，要学会如何去过健康而快乐、平凡而善良的生活。在现代科学主导的现实世界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冲击下，人们当然会对哲学的性质和作用不断发问，作为“王者统治之术”的哲学

可能会产生危机，但慰藉我们人生、交给我们智慧和真理、让我们学会真善美的哲学却是永恒的。这既是哲学的无边无际的魅力，也是哲学永不消退的生命。有人曾经把哲学说成是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无主地带”，虽然有些偏颇，但也恰恰说出了哲学得以发生、发展和继续下去的秘密，它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细细咀嚼，品出其中的滋味。

## 二、哲学的求索之路

回首求学和探索历程，我很幸运地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和名师的培养及宽松的研究环境。高中毕业，我们“新三届”相比“老三届”，有了顺利进入大学进行深造的机遇。1978年我考取南京大学，攻读德语专业。当时南大德语专业很强，名流汇聚，拥有张威廉、林尔康、叶逢植等一批著名教授。张威廉先生不顾80高龄，仍然给我们“文革”后第一届学生亲自上课，林尔康、叶逢植等教授也给我们讲授德国诗歌、德语修辞学等，现在这些课程在不少专业院校也不一定能开出来。正是这些名师的非凡与平实给我以启迪，感染着我在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在大学时就有这样的想法，语言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学习要有研究方向，因此选听了西方哲学史、黑格尔美学等哲学类课程，并对逻辑思辨与哲学玄思产生了浓厚兴趣。凭着对人生意义与存在价值的深刻思考，我放弃了从事其他职业的机会，转向了对哲学的思索。带着这种思考，我在1988~199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师从梁志学先生，专注德国哲学的研究。梁先生是公认的治学严谨的老师，这使我在治学、为人等方面都得到良好的熏陶，并将终身受益。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我在大学毕业后多次去德国学习和进修，如

1984~1985年获德国艾伯特基金会(Friedrich Ebert-Stiftung)资助,前往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正是从这里开始确立了我的哲学研究方向。1994年和2000年,我又得到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和德意志研究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的资助,先后两次去德国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科学院和慕尼黑大学作访问学者。在德国的学习和访问,使我能够得到国外第一手材料,把握国外的学术动态。同时更重要的是,可以把德国哲学与我国哲学相比较,从中得出一些教益。

从我1982年来到中国社科院学习、工作算起,至今从事理论学习和研究已有三十多年了。我感悟到哲学之路是一条充盈着生命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上下求索的艰辛之路。哲学所的研究环境很好,学术氛围浓厚,尤其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上更是注重文本的严谨性,这是几代西方哲学研究者的不懈追求。第一代学术前辈,如贺麟先生、杨一之先生、王玖兴先生等为把西方哲学引介到中国作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像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著作的翻译至今仍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摹本。第二代学术传人梁志学、叶秀山、王树人、薛华等先生等不仅把学术译介深入下去,更是注重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与发展。可以说,我们正处于第三代学术发展时期,我们这代研究者的责任,不但要继承前辈的治学经验与传统,实现第一手材料的掌握与自我理解相结合,即把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还要从更多更深的角度挖掘文本,使之系统化、条理化,实现西学的中国化。时至今日,我已在国内外发表了一些专著、译著、论文,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社科院科研项目。多年的学术生涯给我最深的感触是,做学问永远不能满足,永远都要有所追求。它不但要求挑战极限的智慧,还要求永远执着的、痛苦的生命意识,需要生命的挚爱与奉献。值得欣慰的是,无论在物质匮乏的艰难岁月,还是在欢歌笑语的消费主义时代,

哲学都不乏虔诚的献身者和知音。

就我个人而言，在我原本从事的德国哲学研究中，不仅要注重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德国哲学的研究，而且还要注意德国哲学是如何从近代向现代转化的。这是因为我们在近代哲学是如何过渡到现代哲学方面缺乏探讨和研究。因此，我在这时很自然地想到那个时代的大哲学家狄尔泰，试图通过研究狄尔泰，梳清和理顺德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这是对德国哲学的纵向研究。同时，如果我们注意对狄尔泰进行横向研究，还可以加深对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叔本华、尼采、现象学的认识和理解，并进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我们的西学研究就不只是纯粹的描述，而且还应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理论做出贡献。近些年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的专业视野在不断扩大，不仅要熟读外国哲学专业的重要典籍，而且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了解哲学一些分支学科的基本情况。在这个基础上我发表了一些超出西方哲学研究范围、涉及哲学全学科建设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共鸣。

### 三、深刻的哲学关切

哲学是实践的、生动的，更是深刻的、思索的。作为一位哲学工作者，当然不能满足于对哲学境界的感叹，或是局限于本人所从事的专业，而是要有所进取，有所言说，而且更应当对这门学科加以思索，并且根据中国当下的生活实践，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认“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看法，而是强调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理应在把握哲学史的基础上，吸收时代的内容，在推动历史前行的同时，也赋予哲学新内容、新观点、新方法，努力推动哲学的进步。这或许就是“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要义。

中国过去虽然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却没有完整系统的哲学学科。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哲学是在上世纪初才在中国得以确立的，至今也不过百年历史。我们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完全是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体系在近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迫使我们必须在传统文明与现代世界之间加以痛苦地抉择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虽然在这个学习和接受过程中，我们既有痛苦彷徨，也出现过“全盘西化”和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倾向，但总的说来，在这个百年历史中，我们的哲学事业是在不断进步的，取得了一些成就，呈现了我国哲学的独有特点。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西方哲学传入我国的20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是同时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反对西方近代哲学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主张哲学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并且把自己的使命规定为用革命的实践改造世界。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性和社会性，使其最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性是使它成为中国思想界主导学科的基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发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我们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又是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中国哲学史固然是以自己老祖宗的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但对这门学科的条理化、系统化的研究也是肇始于“五四运动”前后。最初，谢无量、胡适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完全是照搬西方哲学的理路，而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等人则尝试用所把握的西方理性分析去探索、研究中国的哲学问题，力图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新文化的理路。此后，中国学者艰苦探索、筚路蓝缕，在经典解读、哲

学通史、断代史、学派和人物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这方面的成果更加丰硕。但毋庸讳言的是，长期困扰中国哲学史界的两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是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外来哲学的关系和哲学史的研究如何与哲学理论的建构相统一的问题。这两大问题不单纯是学理问题，与国家、民族的实力和地位，与研究者的学养、心态等都有关系，我们不可能指望一朝一夕就能解决。

我国外国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领域。应当说，我们向西方学习是认真和诚恳的，是以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和分析各种思潮和流派。我们不仅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西方哲学研究论著，而且还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判断、逻辑分析、本质还原等方法，再结合中国文化中原有的形象思维、义理结合等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新理路、新方法，创造出中国特有的西方哲学研究新形态。但这个学科中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与我国社会现实相脱离，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相疏离。造成这种状况，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因素是这门学科本身就属于“阳春白雪”式的精神创造活动，而西方哲学又是异质文化，与我们相距较远。而主观原因则在于一些学者缺乏以中国的眼光去研究西方哲学的文化自觉，盲目地跟随西方时尚，以西方的学术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学术，没有自己的创造和建树，在丧失了 we 自身的独立性的同时，也丧失了西学在中国的活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学者的文化自觉，主动地把西学研究与中国文化、国情、现实结合起来，把中国人的视野和世界眼光有机地统一起来，从中寻求解决世界性问题和世界化了的中国问题的普遍原则，最终为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赢得应有的地位提供思想理论资源。

正是基于对我国哲学这三大二级学科的这些分析，前些年我明确提出，我们的哲学理论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而是要从当下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哲学问题，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及其未来导向给出规律性的阐述和有利的理论支撑。所以，当代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和发展机遇就在于正确认识和解答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通过对现实的审视和批判，为当今中国人提供正确的理性思维、价值理想和人生境界，发挥哲学理应具有的指导、规范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实践功能。而要实现这一宗旨，哲学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在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的前提下，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

具体而言，我们的哲学应当实现这样几个转变：第一，从“体系意识”转变为“问题意识”，实现哲学范式的改变。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我们是否要面向生活世界，而且还更在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不依赖于我们的主观意识去客观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问题。因此，自觉地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做出深刻反思，在思维方式、认识方式和表达方式上大胆创新，勇于解答当代的重大思想问题，引导和塑造时代精神的发展，才能实现哲学的当代价值。第二，从“本土视域”转变为“世界视域”，努力扩大我们的哲学视野。哲学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学问。我们中国的哲学在着力解答中国现实问题的同时，还必须面向世界，要对探索世界性的普遍真理做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第三，从“马、中、西”三个学科的分立转变为三个学科的“视域融合”，逐步确立“大哲学”的观念。哲学原本是包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但我国哲学界近几十年来一直受三个学科的人为划分而壁垒分明，导致了眼界狭隘、思想僵化。但另一方面，哲学面临的问题往往又具有全局性、共同性和根本性的特点，以一两个

分支学科的知识是根本无法应对和解答的。所以，哲学家必须打破学科分界的限制，努力汇通各门知识。

要实现这“三个转变”，哲学工作者只有以高度的理论勇气和博大的学术胸怀，自觉地摈弃实用主义的现实论证和陷于形式主义的学术诉求，兼容并蓄，融通中西，将古今中外的一切先进哲学思想为我所用，才能实现哲学宗旨，彰显出我们哲学事业的新面貌，创造出中国哲学的新天地！

#### 四、人在途中

这个自选集一共收录了我自 80 年代末以来发表的 21 篇哲学论文，分为“哲学总论”、“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七篇文章主要反映了我的哲学观念和对一些专业问题的跨学科探讨。其中，第一篇《中国的哲学现状、问题和任务》、第三篇《哲学的危机与哲学的慰藉》和第五篇《再论西学东渐和现代中国哲学》集中表达了我的“大哲学”观点和我借一篇小小的书评以及“西学东渐”这个话题所表达的哲学感悟。第二篇《哲学与自由》集中讨论哲学的核心命题“自由”，强调当下区分自由与散漫，为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公正奠定哲学基础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文化保守主义抑或文化批判主义》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商业道德的若干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两篇论文是分别就我国“国学热”现象和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哲学思考和分析，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西方哲学研究 30 年（1978～2008）的反思》则是专门为纪念在安徽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三十年而写的一篇论文，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近三十年的得与失予以总结和分析。

第二部分收集了我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方面的六篇代表性论文，

其中《道德敬畏与价值判断》的英文版收录在由德国歌德学院专门为纪念康德逝世二百周年而在全世界征集的文集里，这个文集2007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世界哲学领域影响较大。《绝对与人类自由》一文是对谢林晚期代表作《自由论》的探析，并由此对自由与必然、体系与个体、上帝启示与人类行为等根本性问题予以探讨和解答。

第三部分收集的是我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八篇论文。其中三篇关于狄尔泰的文章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意在通过研究狄尔泰来理顺德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三篇关于阿多诺的文章则是我在伦理学和美学方面的探讨。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部分的第一篇和第八篇。第一篇《现代西方哲学的流变及启示》着重考察黑格尔以后的西方哲学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同时强调中国学者在面对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现代西方哲学时，理应有自己的客观分析和理性判断，不能人云亦云，丧失我们的理论自觉。第八篇《新康德主义》原本是《西方哲学史》(学术版)中的一部分，是国内研究新康德主义较为系统完整的一篇，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肯定。这次所以把它收录进来，不仅在于重视它的学术价值，更多的还是想为国内当下的文化研究增加一个学术和理论的参照系，因为一百年前在欧洲大陆盛极一时的新康德主义在文化学、人类学、价值哲学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为哲学发展和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今天的我们重视和借鉴。

这个自选集反映的是我从80年代学习、研究哲学以来的一些哲学思考和心得，也记载着我的学术追求和心路历程。对于一个正当努力前行的哲学工作者来说，我今后的路还长，需要思考的问题还很多。更何况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哲学所追寻的“真、善、美”是一种方向和境界，人类在这个领域有无数个谜底需要求解，有不尽的山峰需要攀登，而我只是这支求索、攀登队伍中的一员。所以，“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只是我心灵的真切写照，也是所有哲学家理应具有的胸怀和执着。对此，我们不应有任何怀疑和彷徨。哲学一直与人类同行，人类在前进，哲学不可能固守不变的问题和不变的定位，而是内在于人的生存和人类历史中的一种生生不息的理性反思和文化批判，这正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本性和哲学的本质。所以，我们作为哲学工作者理应永远怀有这种豁达的胸襟和执着的追求。

哲学人永远在途中！

值本书出版之际，对于一直关心和帮助我的亲朋好友、资助本书出版的北京市社科基金办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选编与成书均得到我的学生李俊文的帮助，特此致谢！

谢地坤

2013年8月25日

城南世华水岸